

道教的教育和道士的培養

The Education on Taoism and Forster of Taoist

陳耀庭

CHEN, Yaoting, Professor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ang hai

摘要

道教由於生存和發展的需要，自創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視教化信徒和培養道士，認為“立觀度人”是修道之“首務”。但是，道教採用的方法，只是“師傅帶徒弟”和自學。因此，教育方法的滯後，加上人力和財力的匱乏，影響了道教的發展，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後的幾十年間，道教發展停滯，道士數量減少和素質下降。

中國大陸在近二十年來，隨著社會改革開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貫徹，道教宮觀逐漸恢復開放，道教活動逐漸活躍，迫切需要一大批道士參與齋醮禮儀活動，為道教信徒服務，同時需要一大批道士從事宮觀修復管理和道教組織管理等活動。為此，中國道教協會和各級地方道教協會以及各名山宮觀都大力開展道教教育的工作，並且將培養青年道士當作“關係道教生存發展的頭等大事”。

當代中國大陸道教教育的指導思想是“培養愛國愛教的、具有較高道教知識修養並有志於為道教事業服務的青年道教徒，繼承和發揚道教優良傳統，弘揚道教文化”，採用的方法是在保存“師傅帶徒弟”的傳統基礎上，創辦開放式的學校和培訓班、專修班，廣泛吸收社會師資力量，設置儘可能完整的課程內容體系，密切聯繫當代宮觀管理和社會生活的實際，以造就一批有信仰、有道教學識、有社會活動能力的青年道士。

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有道教宮觀近1600所，道士近30000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近二十年培養的青年道士。大約有千餘名青年道士走上了道教宮觀管理和各級道教組織的領導崗位。他(她)們是中國道教近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巨大財富。他(她)們的適應時代、密切生活、有活力的宗教活動，將會對二十一世紀中國道教發展和走向帶來巨大的影響。

前言

中國道教有一些名言，例如：“法由聖顯，道寄人弘”，“道由人顯，亦賴書傳”等等。這些名言說明道教對於道教的教育和道士的培養是十分重視的。之所以重視，是因為中國道教作為一個自東漢末年形成的宗教組織，從成立之日起，就有一個組織傳承的問題。既然是組織，就要有人；既然要傳承，就要有源源不斷的道教徒。從道教組織特點而言，道教徒包括道士（神職教徒）和一般信徒兩類。不管是一類，兩類道教徒都依靠道門自己培養。

本文就中國道教如何培養教徒的問題，從歷史的教訓和現實的經驗兩方面作一些探討，並且希望能對二十一世紀道教的發展有益。

一， 道教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

道教教育的歷史過程 一般認為，早期道教有二派，即太平道和正一盟威之道（即五斗米道）。太平道如何培養教徒，史載不詳。但是太平道有《太平經》。《太平經》中多有強調學習重要的言論。例如：卷97“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稱：“人安得生為君子哉？皆由學之耳。學之以道，其人道；學之以德，其人得；學之以善，其人善；學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乃復大益善良”。¹《太平經》所說的“學”既包括修道人的自學，也包括師長的教育。卷109《兩手策字要記》稱：“夫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²，這裡，將師長的地位放到了教化之本的地位，因此，太平道的培養教徒可能就是依靠自學和師長的教化。正一盟威之道，史載有“鬼吏”和“鬼卒”的組織制度。開始學道稱為“鬼卒”。另外設有“祭酒”之職，“祭酒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³當是教化和培養教徒之職能。

魏晉時期，道教開始建立館舍。館舍成為道教徒修道、傳道和教化信徒的活動場所。據稱，南朝齊梁陳三代建立的館舍達100餘所。《晉書·許邁傳》稱許邁“立精舍於懸霤”。⁴陸修靜在廬山“爰構精廬”，後以其故居為“簡寂館”。這些館舍都是傳道、

1 《太平經合校》，433頁，中華書局，1960年。

2 同上，517頁。

3 《三國志》卷8，第1冊，頁264，中華書局，1959年。

4 《晉書》卷80《王羲之傳》附《許邁傳》，中華書局，第7冊，2107頁。

授徒的地方，就是一所道教學校。隋唐至宋時期，道教館舍不斷增加，規模擴大，多稱為宮觀。宮觀的功能也逐漸擴大，但其傳道和教化信徒的功能依舊。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宋徽宗“詔諸路監司，每路通選宮觀道士十人，遣發上京，赴左右街道錄院講習科道聲贊規儀，候習熟遣還本處”，⁵這大概是中國道教史上第一所在政府道教管理部門領導下的全國性的道教學校。道士學習的大經有《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有《南華真經》、《沖虛真經》等。不過，這所學校只辦了二年，就在儒生的反對聲中停止了。

歷史上道教教育的方法是“立觀度人”和“師徒傳承” 道教教育的方法，在元代全真道派的發展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元代初期，丘處機由於得到了元太祖成吉思汗的信任，掌管天下道教，在從西域回燕京的途中，在1223年的蓋里泊對其弟子提出了抓住“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的時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⁶依靠“立觀度人”的方法，全真道派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地區迅猛發展。史載，僅丘處機的弟子劉志源在河北大名路就修建道觀200餘所，度化弟子3000餘人。《修武清真觀記》稱“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史稱，1228年丘處機安葬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⁷1241年會葬王重陽，“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⁸

“立觀”是全真道派的出家制度決定的。王重陽《立教十五論》稱：“凡出家者，先須投庵”。庵就是道觀。沒有道觀，出家的全真道士無法生存。度人，也無從談起。“度人”就是教化和培養信徒。其方法仍然是師傅帶弟子的老辦法，只是收徒數量大大超過以往的道門。史載，繼任丘處機掌教的尹志平赴陝西興建了二觀四宮，度千人為道士。⁹很難想像，在二三年中，這千人個個追隨於尹志平的周圍，接受尹的面授和教誨。可能就是在實踐中，全真道派逐漸形成了師傅以“傳經”和“傳戒”的形式集體授徒。這一集體授徒活動，大約在清代初年的北京白雲觀王常月的三次“傳戒”中達到了高峰。三次“傳戒”，王常月度化全真龍門派弟子一千餘人。正是依靠弟子們的努力，龍門派出現了“中興”，其影響一直保持到三百年以後的今天。

明代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掌管天下道教事務以後，針對道門中存在的問題，著有

5 《續資治通鑑》卷91，第5冊，2359頁，中華書局，1957年。

6 《甘水仙源錄》卷10，《大都清逸觀碑》，《道藏》，第19冊，809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

7 《甘水仙源錄》卷9，《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道藏》，第19冊，796頁。

8 《甘水仙源錄》卷3，《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道藏》，第19冊，741頁。

9 《秋澗文集》卷56，《大元故清和妙道廣化真人玄門掌教大宗師尹公道行碑銘》。

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方面，沒有什麼大舉措。其結果就使中國道教的素質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線上。小道士雖然各地仍有培養，但都是各山各廟師徒傳承，數量逐漸減少，高水平的道士更是鳳毛麟角了。

二，當代道教教育的新面貌

現代的道教，從傳播地域上區分，實際上包含著三個部分：中國大陸的道教，中國港澳台地區的道教，海外華人聚居區的道教。這三部分道教，由於生存環境不同，因此，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它們在生存和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也不一樣。但是，從其傳播歷史來說，其信仰和供奉神系來說，三個部分道教又有密切聯繫。港澳台地區的道教徒和海外華人中的道教徒，都以中國大陸的道教作為自己信仰的根，大多以中國大陸某個廟觀作為祖庭。道士都自稱淵源於大陸道教的某個門派，出自大陸某位高道的門下。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大陸的道教是現代道教的標誌。

從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特別是1982年以後，中國認真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道教也出現了振興的態勢。這一點，從幾個統計材料可以看出來：

據李養正先生在1994年的《道教史略講》中說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國有道教宮觀637座，住觀的道士約有五千人，散居道士約有數萬人。

1982年，在大陸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被批准開放的道觀僅僅只有21處。道士只有幾百人。許多地方的道士沒有經書可念，沒有道觀舉行科儀活動。

1994年，經過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據李養正先生說，全國道教宮觀有近一千處，全真道士近一萬人，散居道士二萬人。

到了1996年，據李養正說，“據中國道教協會在1996年的調查統計，全國現有開放的道教宮觀1722座，其中992座已向縣以上政府發登記；住觀職道士7125人，其中全真派道士6450人（乾道4139人、坤道2311人），正一派道士685人，另有正一散居道士三萬人，合計約四萬人；近四十年來，先後成立了各級地方道教協會組織約133處”¹⁴

道教界的前輩們說，“今天的道教到了近百年來最佳的發展時節”。這句話是不錯的。這裡說的“最佳時節”，包含的意義，不僅是宮觀恢復，道士人數恢復，而且還說

14 另外有材料說，中國大陸的道教宮觀已經開放了1557座，住觀的全真和正一道士，包括坤道達到25700人，散居道士數萬人。

明道教的恢復是在一個新水平上的恢復。道教的整體質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對於這個說法，我是有同感的。因為，我的家庭就是一個世代正一派道士的家庭。我了解道教的過去，至少是了解本世紀上海道教和江南道教的狀況。我的祖父陳榮慶先生，是清代末年上海的最後第二任道會司的道官。我的父親陳蓮笙先生從小學道，1949年以前就是上海著名的高功法師，當時的上海道教組織的理事。1957年以後，一直擔任中國道教協會的理事，還曾擔任過中國道教協會的副會長和顧問，上海道教協會的秘書長、會長和名譽會長。我本人在1947年至1955年間也一直混跡於上海道教之中，直到我進入北京大學學習。所以，我可以不帶任何偏見地說，今天大陸道教已經出現了過去想都不敢想的巨大的變化。

道教的變化，我想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道教的組織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現代社會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大陸的社會組織化程度也越來越高。1957年，中國大陸成立了跨宗派的道教組織，也就是中國道教協會。但是，1957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左”傾思潮，因此，嚴格地說，中國道教協會從成立起就沒有能按其計劃和章程正常運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道教協會已經恢復正常活動，各省市也成立了各級道教組織，一些縣里也成立了縣級的道教組織。雖然，中國道教協會和地方道教協會只是業務上的指導關係。但是，因為有了統一的合法的道教組織，道教徒才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在國家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取得了應有的地位。中國大陸的各級議會組織中都有道士的代表。這一點，在改革開發前的三十年中是不敢想象的。

二是道士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1949年以前學道的道士，絕大多數沒有文化，只是進了道門以後才認識經書上的字。我本人原定於1949年7月小學畢業以後學道，這在當時，已經是非常有文化了，1949年以後，在中國大陸，很少有人想來學道，因此，整整三十年裡，道教沒有認真培養過接班人。1957年，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以後，在陳撈寧會長主持下，舉辦過“道教知識專修班”，但是參加的都是中年道士，人數也不多。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道觀的逐漸增加開放，學道人數迅速增加。這些新道士，大多已經完成普通學校的學業，有的還有高中水平，為了迅速提高他們的道學修養，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了中國道教學院，上海和四川成立了上海道學院和四川道學院。中國道教學院和地方各級道教協會還舉辦一系列的專修班、訓練班和學習班，加快培養道教人才。據統計，中國道教學院自1982年至1994年，培養了全國各地各宮觀送來的學員303名，大約是以前培養的十倍。至於各地自己培養的道教人才，超過千餘人。其中一些較早學道的青年道士，已經走上了道教的領導崗位。他們受過比較系統的道教知識的培訓，既注意

繼承道教的優良傳統，又能自覺適應當今中國社會，自覺維護道教的合法權益，相互團結，在社會上用一個聲音說話，顯示出中國道教是中國社會一支不可替代的社會力量。這一點也是前三十年中不敢想像的。

三是道教開始注意弘揚自己的思想和文化。道教以道家思想為教義核心，因此，在人生觀和社會觀層面上，道教是以“無為”和“不爭”為特徵的。道教對於自己的傳播也向來抱著“道法自然”的態度。道教不僅沒有像西方宗教那樣，要讓中國人都變成馴服的羊群，“中華歸主”，甚至像佛教那樣用“講經”來宣傳自己的做法都沒有。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道教自己沒有一份弘道的雜誌和報刊。眾所周知的《揚善》半月刊和《仙道月報》是翼化堂主張竹銘創辦的。可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道教，由於一批熟悉現代生活的青年的加入，在宣傳和弘揚道教思想文化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新舉措。中國道教協會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地方道教協會也相繼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室。現在中國道教協會的《中國道教》雜誌已經公開出版，並且從不定期刊物變成了季刊，又變成了雙月刊。地方的道教協會也出版了《上海道教》、《三秦道教》、《福建道教》、《廣東道教》和《茅山道院》等內部雜誌和報刊。中國道教協會和地方道教協會還公開出了250萬字的《道教大詞典》以及一系列研究道教思想文化和介紹道教名山洞府的著作、音樂錄音帶和記錄重大科儀活動的錄像帶，等等。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弘揚道教的思想和文化，使社會對於中國道教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理解。這一點，也是前三十年中不敢想像的。

從以上三方面的變化，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國道教已經出現了近百年未曾有過的振興局面。這個局面的出現是與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分不開的，也同道教自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分不開的。道教自身發生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是一批受過道教教育的青年道士充實到了道教徒的隊伍之中，給道教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三，當代道教教育的指導思想和教育方法

道教院校的辦學宗旨 在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道教走向振興的時候，各地都出現了有道觀沒有道士、有建立道教組織的機會，卻不具備人力成立組織的尷尬局面。這是因為老道士年邁體弱，無法勝任，而青年道士卻因為有近三十年沒有培養，所以，各地各宮觀普遍出現形勢大好，後繼乏人。

為了解決這個尖銳的矛盾，中國道教協會在1990年正式成立了中國道教學院。經過十餘年教學實踐，中國道教學院已經具有較為完整的課程設置，建立了水平較高的師資

隊伍。這所學院的教育目的與任務就是：“培養愛國愛教的、具有較高道教知識修養並有志於為道教事業服務的青年道教徒，繼承和發揚道教優良傳統，弘揚道教文化”。它以各地各宮觀送來的青年道士為主要對象，其畢業生也已經遍布各地。與此同時，上海道教協會成立了上海道學院，四川青城山道教協會成立了青城山道教學校，廣東省道教協會和黃龍觀相繼舉辦了培訓班，各地道教協會也舉辦了不同期限的道教知識專修班和經韻培訓班等等。這些道教院校和培訓班都以青年道士為培養對象。以上海道學院為例，上海道學院是由上海道教協會舉辦的，經過十多年的教學實踐，也已具有較完整的課程體系，建立了較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它主要為上海地區培養正一派道士，以培養“有相當宗教學識的年輕宗教教職人員隊伍”為目標。從大陸各道教院校和培訓班已經公佈的受教育的人數來看，受益的青年道士有千餘人。這些青年道士在畢業或結業以後，及時充實到了各地道教協會或宮觀中，緩解了道教走向振興時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化和不斷進步，許多較早進入道門的青年道士從自己學道和修道實踐中感到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不敷所用，因此，他們在業餘時間中繼續努力學習，有的參加了社會學校的業餘學習，學習文檔秘書、財務、管理、電腦和電工等專業，有的還參加了社會的大專水平自學考試，以提高自身素質。為了滿足青年道士合理而迫切的要求，中國道教學院和上海道學院又先後舉辦了相當於大學專科水平的進修班。將來在條件具備的時候，在徵得主管部門批准以後，道教協會還有意培養相當於大學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水平的班級，目的就是要培養有較深道學修養和道法造詣的青年道士，以適應道教事業未來的發展。

道教院校的辦學方式和方法 當今進入道門的青年道士，一般都已受過初等教育或者中等教育。這些社會教育同道教院校的教育是不同的。其不同處主要是前者不包含道教信仰的內容，但是，它又為受教育者打下了文化知識的基礎和社會活動能力的基礎。據此，道教院校對青年道士的培養，一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直接與社會教育相銜接，不再重複，一方面又大量增加有關道教信仰的內容，重點放在道教教義教理的學習、道教文化歷史的傳授和科儀經韻的培訓等等。在教育方式上，道教院校採用了青年道士已經習慣的課堂教育方式，並且與道教傳統的師傅帶徒弟的教育方式相結合。這樣就能保證培養工作既符合道教的要求，又縮短了培養時間。

青年道士的培養，按照傳統，歷來是由德高望重的老道士負責的。可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各地道教協會在恢復道教活動時，僅有的一些老道士忙於應付宮觀修復和經懺業務，另外也缺乏相當的道學修養，更缺乏能用新形式傳授道教知識的老道士。因此，

一段時間裡，道教院校和各種培訓班在選擇師資時，採取“不拘一格”的原則，這就是說，不分地區或派別，不論年長或年少，不分教內或教外，只要有相當的道教知識修養和研究成就的，只要尊重道教的教義教理以及禮拜活動的，只要作風正派、學風嚴謹的，都可以作為道教院校的教師，請來講課。

道教院校的課程設置，經過十餘年的教學實踐積累，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課程體系。道教院校的課程有政治、文化和道教三大類。以上海道學院的課程設置為例，三大類課程的學時比為1:2:7。其中政治課程指的是“宗教政策法律法規”、“法學概論”等。文化課程指的是“高中或大學語文”、“高中或大學中國歷史”、“高中或大學英語”、“中國哲學史”、“書法”等。道教課程指的是“中國道教史”、“道教經籍選讀”或“道教原典選讀”、“《道德經》講讀”、“道教音樂”、“道教經韻”、“早晚功課”、“道教科儀與符籙”、“道教文學”、“道教倫理”、“道教與科學”等。在大專班級裡，還安排一些講座課程，如：宮觀管理、心理學、公共關係學、諸教介紹，等等。

道教院校培養的是有學識的道士，因此，道教院校一般都設置在道觀之中。學員要穿著道裝，按時參加早晚功課，念經禮拜。道教院校的學員是學生，但首先是個道士，要會念經做法事。中國道教學院的學員來自各地各道觀，畢業或結業以後，還回到原地原宮觀學道修道。至於地方道教院校，例如上海道學院，學員在第三學年就被分配到上海的宮觀拜師實習。這樣就既保持了道教原來的授徒傳統，又能在實際中進一步培養青年道士。

通過這樣的方式方法，一個道教院校的學生，一般來說，都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順利地完成從一個普通的社會青年向一個有信仰、有道教學識的道士的轉變。通過規定時間的學習，他們無論在思想信仰上、在道教知識上、或者在齋醮科儀上，都會有比較迅速的提高。當然，院校方面反覆強調，學員們也清楚明白，樹立對於道的信仰是一個道士努力一輩子的事情。從道教院校畢業或結業，只是他們從道的第一步。

四， 中國道教百年未有的巨大財富

一代青年道教領袖將帶領新世紀的道教更具活力 1998年8月，中國道教協會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幾位曾經領導了道教振興工作的年事已高的老道士退居顧問位置，一批青年道士走了領導崗位。各地方道教協會也相繼換屆，增選了一批青年道士進入地方道教協會的領導崗位，使得中國大陸道教的領導層一派生氣勃勃。

在中國道教協會第六屆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長人選中，除了1924年出生的閔智亭會

長、1936年和1945年出生的任法融、劉懷元副會長、1939年出生的袁炳棟秘書長以外，其餘6名副會長都是1949年以後出生的。其中年齡最長的是王光德，1949年出生。50年代出生的有2位，即：賴保榮和唐誠清。60年代出生的有3位，即：張繼禹、黃至安和丁常雲。丁的年齡最小，出生於1964年。這6位51歲以下的道長，都是近二十年由道院校培養出來的，王光德、唐誠清、賴保榮和張繼禹都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黃至安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坤道專修班；丁常雲畢業於上海道學院，現在還是中國道教學院上海進修班(大專)的學員。一些地方道教協會的領導工作，也都由青年道士擔當。例如：江蘇省道教協會的會長就是1964年出生的楊世華，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江蘇省道教協會的副會長、蘇州市道教協會會長是1962年出生的張鳳林，他也是畢業於1984年中國道教學院。福建省道教協會會長林舟，也畢業於中國道教學院。上海市道教協會會長史孝進，畢業於1986年上海道學院第1期道學班，現在是中國道教學院上海進修班(大專)的學員。

以上列舉的部分中國道教青年領導人員的學道經歷，就可以說明，近二十年中國大陸道教創辦的各種道院校和專修班對於道教的弘道事業以及今後二、三十年的發展可能產生多麼巨大的影響。

張繼禹是江西貴溪人，出身於江西龍虎山天師世家。他從中國道教學院畢業後，就留在北京邊工作邊進修。除了教內職務以外，先後擔任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7、8屆委員，現在是第9屆全國政協的常務委員，代表道教參予國家的重大政治活動。張繼禹現在還是《中國道教》雜誌的主編、中國道教協會的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道教學院副院長。在十分繁忙之中，張繼禹編寫過《天師道史略》等著述，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現在，他還主持出版標點排印本《中華道藏》的巨大工程。近年來，張繼禹代表中國道教參加了許多國際活動，例如：1995年參加了在英國召開的“世界宗教與環境保護會議”，1998年參加了在英國召開的“世界(宗教)信仰與發展”會議，1999年參加了在美國召開的“人類健康與環境和諧研討會”。在會議上，張繼禹發表了《道教對世界環境保護主張》、《道教對發展及經濟生活的理解》、《道教對發展中醫藥和保護野生生物的理論和實踐》等演說，並且在與會期間，廣泛會見了各國各宗教的代表，在張繼禹身上，人們可以明顯看到宗教領袖的風度，從容自如的社會活動能力。

丁常雲是江蘇句容人。自上海道學院畢業後，他就從事創建道教文化研究室和編輯《上海道教》雜誌等工作，先後當選為上海道教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理事、副會長，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委員、中國青年聯合會委員。1995年起，還任上海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上海道教》雜誌主編。近十年來，丁常雲一直從事道教的學術研

究工作，先後編寫過《呂祖無極寶懺注》、《太上感應篇注》、《諸真寶誥注》以及《改革開放新形勢下的上海道教文化》、《道教的城隍信仰及其社會思想內容》、《道教的禳鎮科儀及其功能》等重要論文。1998年他作為中國道教文化代表團赴台灣地區發表了《道教宮觀的神緣功能》的演講。1999年還作為中國宗教代表團成員，到伊朗參加了亞洲宗教和平理事會會議。丁常雲現在還兼任上海欽賜仰殿道觀住持，需要在道觀管理工作中積累經驗，但是他作為在道教學術研究中已經頗有成就的青年領袖的形象已經確立，並且今後會對道教內部的學術研究和弘道工作發揮影響。

王光德是河南人，他從中國道教學院畢業後回到武當山，先後擔任過武當山道教協會秘書長、副會長和會長，湖北省道教協會副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第五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湖北省十堰市政協副主席，湖北省政協常務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在第六屆中國道教協會代表會議上，王光德當選為副會長。王光德近年也有一些著述，例如：《武當山道教史略》、《仙山武當》等。但是，他的特長是宮觀管理和社會活動。據說，王光德回到武當山時，紫霄宮、太和宮建築破落，雜草叢生，道士生活十分困難。生活在著名的“金頂”的道士，沒有水喝，沒有電燈。王光德花費了巨大的心血和全部精力，面對各方插手開發武當山的巨大壓力，積極依靠政府有關部門，到市、省和首都爭取支持和經費來源，艱苦奮鬥，風餐露宿，夜以繼日，終於修復了紫霄宮、太和宮，並且為金頂先後新建供水和供電工程，從根本上改善了武當山道眾的修道條件，也改善了武當山的旅遊環境，獲得了遊客和當地群眾一致的讚譽。自1993年起，王光德受到海外的玄天上帝的道教信徒的邀請，先後到新加坡、日本、意大利等國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傳播武當山的道教武術、道教科儀和養身文化，把武當山介紹給世界各國和海外華僑、華人。當地的道士稱王光德是武當山守護神，說明他是用心血在澆灌武當的壯麗山川。

楊世華是江蘇句容人。楊世華從中國道教學院畢業回到茅山以後，先後擔任過茅山道教協會副會長、秘書長、會長、句容市道教協會副會長、鎮江市道教協會會長、江蘇省道教協會會長、中國道教協會理事、常務理事、江蘇省青年聯合會委員、江蘇省政協委員、茅山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茅山道教》主編。楊世華也是一位以管理能力見長的領袖。自回到茅山起，楊世華就將全部精力投身於恢復和振興茅山道教的工作，解決了茅山頂宮(九霄萬福宮)的用水和用電問題，重新對頂宮的殿堂設置作了佈局。面對茅山印宮(元符萬寧宮)在抗日戰爭被毀壞，長期未能修復的破落狀況，楊世華在市、省和中央的支持下，不失時機地領導茅山道眾對印宮進行了規模空前的重建工程，自籌資金三千餘萬元，建設了上下四層的“道祖廣場”。最下層為“睹星門”廣場，第2層為“三天門”廣場，第3層為“太極廣場”，第4層，即最高層，為“道祖廣場”。道祖廣場中央

有太上老君的坐像，高33米，坐像建築於直徑22米、高5米的圓台上。當地民眾稱它為“老子天下第一”。同時，楊世華也十分注意弘道揚善工作。茅山道院設立了文化研究室，並且出版茅山道教的音樂錄音帶、錄影帶、出版道教文化書籍和科儀經本，總數已達數十種。

從上面介紹的四位年輕道教領袖的風采，人們可以看出今天中國大陸的青年道教領袖是各有所長的。我們大致可以將他們區分為：“社會活動家型”、“學者型”、“管理型”、“科儀型”等四類。這些青年道士所處的當代社會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我們不能苛求他們成爲全才或者通才，只要有一個方面的特長，以他們所處領袖的地位，就可能對於道教的全局或者局部在今後幾年或者幾十年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上面列舉的四位年輕道教領袖，只不過是近二十年來湧現出來的青年道士中的代表。我們如果以1996年統計全國有133個縣級以上的道教協會爲依據，設想如果每個協會有10名青年道士擔任不同層次的領導工作，那麼全國至少已經有了1330名青年道教領袖。這些領袖都是道教的人才。前賢說：“道由人顯”。有了這些人才，道教就有希望，有實力，有將來。這樣數量的人才是中國道教近百年來從沒有過的巨大財富。當然，這些領袖還年輕，在今後的學道生涯中，其中某些人有可能出現種種曲折。這是不奇怪的。事實上，省市級的道教青年領袖中也已經出現過曇花一現的人物。但是，正因爲有了這樣的數量，就爲中國道教在未來選拔領袖準備了條件。有了這樣的數量，人們自然可以期待道教繼續振興和發展。

從現在培養的青年道士的身上，我們可以估計中國道教未來將會出現某些新變化。

首先，道教將繼續獲得發展，道觀繼續增加，青年道士數量繼續增多，以滿足新世紀中人們仍然存在的宗教信仰的需要。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道教的發展，雖然是道教自身努力的結果，但是，歸根結底是中國大陸社會存在著道教以及其它宗教得以發展的客觀原因。這些客觀原因今天並未消失，而且由於社會經濟運作方式和內容的深刻變革，社會分配方式和內容的深刻變革，社會的思想、道德和價值觀念的多元存在和多元選擇，加上社會老齡化問題的突現、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滯後等等問題的出現，現在又增加了許多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新因素。因此，社會存在著道教繼續發展的條件。對此，道教的青年領袖們由於生活在民眾之中，心中是一清二楚的。張繼禹在《中國道教協會五屆理事會工作報告》中，在談到“今後的工作意見”時明確指出：“道教正處在歷史發展的大好時期”。這個歷史發展的有形顯示，就是“立觀度人”。張繼禹在報告中說到，某些道教宮觀尚未交還給道教，某些地方的道教界的權益還沒有保障。因此，繼續落實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落實政策的結果必然是一些著名的道觀或者群眾有要求的道觀又要相繼開放。張繼禹認爲，能不能抓住這個時期，關鍵是看道

教自己。張繼禹指出：“培養人才是當務之急”。爲此，他提出了培養人才的近期目標和中長期計劃。近期目標就是繼續培養教務和管理人才。中長期計劃就是努力培養和造就一批有較高學識的教學和研究人才。有了足夠的人才，就可以應付道教仍然繼續發展的局面。張繼禹在報告的結尾處，充滿信心地預言：“道教事業一定能夠振興發展，道教的未來前景將會更加美好。”¹⁵

其次，道教和社會生活將越來越緊密，道教和中華傳統文化一樣會面臨挑戰，因此必然會發生適應性變化。青年道教領袖都來自社會，他們同社會生活有緊密的聯繫。這些年來，我親眼看到，他們在組織恢復或修建道觀時，對於道觀內設施的要求完全是按照社會的水平，因此電燈、電話、電傳、電腦、電視、音響、燈光照明、衛生設備等等一應俱全。爲了工作的方便，他們大多身上配備有手機，有的還帶有手提電腦。他們熟悉經濟運作的環節，善於經營。無論是爲修復工作或者爲法物流通，他們與商人談判合同和價格時，討價還價，寸步不讓。如果他們不是穿著道裝，看起來與一般的商家並無差別。不過，他們說，他們這樣做是爲了維護道教的利益，這一些在中國道教史上是從未見過，而且爲許多高道所不齒的。如果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那麼，中國道教未來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世俗化的問題。不過，道教乃至於中華傳統文化不會輕易丟失。歷史上每當出現大發展的時候，必然同時會出現對傳統的回歸。所以，下一世紀中，中國道教在世俗化的同時也必然出現對於道教傳統的回歸，也就是廣泛意義上的“原教旨主義。”兩股思潮對抗融合，就會產生發展。道教的歷史，過去就是在改革和復古的矛盾中前進的。青年道教領袖們會利用自己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地位，繼承道教優良遺產，發揚道教優良傳統，尋找到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第三，道教的教義教理、科儀道術、規戒制度等各方面都會適應社會，發展變化。今天的青年道士都是生活在社會對宗教的性質和功能的認識逐漸趨於科學而合理的條件下，他們在學道的過程中，也已經接受了大量現代學術界對於道教和宗教的研究成果，因此，他們都明白，道教適應社會的要求並不是某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道教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張繼禹在他的《關於道教現狀和弘揚道教問題的思考》一文中就明確地說過，“弘揚道教以適應現代文明，並爲促進現代文明健康發展作出新的貢獻，是我們道教徒的普遍願望，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¹⁶。因此，未來的中國道教，在內容和形式上將要發生變化是自然的事情。

就內容而言，張繼禹在上述文章中明確地表述過他作爲道教領袖的看法：“當今之道教，就是要承揚和弘揚道的根本教義思想，並隨社會的文明發展進一步豐富發展經教教義，從而建立起切合社會文明的教義體系，裨益於人類的文明進步”¹⁷。

15 《中國道教》，1998年，4期，17、18頁

16 《中國道教》，1996年，2期，14頁

17 同上。

就形式而言，涉及到許多方面，在宮觀和協會管理方面，一些有效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必然並且已經進入了道教的管理工作，例如：上下班考勤制度、殿堂管理的考核制度、襯資(即工資)加獎勵的分配制度、各種收入來源的管理制度，及時將道士和職工生活福利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在科儀道術方面，隨著信徒生活節奏加快，精神世界問題的增加，科儀時間必然並且已經縮短，科儀內容必然並且已經正在調整，新的科儀必然並且已經出現。科儀壇場的佈置、道士的服裝、壇場的法器以及科儀的音樂，如何滿足當代信徒的審美要求等等。在規戒制度方面，人們常常把焦點聚集在全真派的出家制度和清規戒律上。未來是一個崇尚個性的時代，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多元的。不要說全真派能不能堅持出家制度，獨身主義本身就是時髦的社會潮流。不要說全真派能不能堅持吃素，堅持吃素本身是一種時尚的養身方法。所以，對此不必作太多的猜測。這方面的變化，只能是“道法自然”。歷史形成的規戒制度都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有關，當時有其合理性。今天社會發展，合理性成爲不合理性了，規戒制度就會變化。但是，當代社會矛盾重重。人們精神負擔很累，如果道教的規戒制度方面出現多元現象，或者在執行規戒制度方面出現變化，也都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張繼禹在上述文章中說到：“道教現狀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但根本問題在於道教傳統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這個根本問題在不同層面的表現”¹⁸。可見，對此，道教的青年領袖們十分清楚。

最後，道教將在信仰領域中面對激烈競爭，強化組織，培養人才，形成比較有力的宗教實體。未來的競爭將日益加劇，道教已經遇到並將面對更多的挑戰。這種挑戰有的來自傳統成分，有的來自新的成分，例如：各式各樣的新宗教或者“邪教”。青年道教領袖都非常清楚，應對挑戰的最緊迫的任務，是練好“內功”。這裡的內功，並非內丹功法，而是指在組織上，加強道教的自身建設，培養更多的優秀的青年道士，團結好普通教徒，全心全意爲信徒服務。因此，這些年輕的道教領袖都強調道教自身建設的問題，楊世華在最近召開的江蘇省道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上說到要“不斷加強宮觀管理和道教自身建設”，認爲“培養道教人才是關係道教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也是省道教協會的一項重要工作”¹⁹。林舟在福建省道教協會1998年副秘書長以上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談到要“加強自身建設，促進道教事業的健康發展”，也認爲“大力培養愛國愛教，有較高文化水平的道教人才，是道教事業發展的關鍵”²⁰。青年道教領袖們的共識並非偶然，更不是由於某人的指示。因爲他們都明白，幾千年的道教傳統要在他們手上繼續，他們既有歷史的責任，也有發展的使命。所以，儘管目前各地的道教協會還是

18同上。

19《茅山道教》，第6期，第3版。

20《福建道教》，1998年，第1期，2頁，

處在“屬地管理”體制下，但是，無論是中央和地方，或者地方和地方，道教界的縱橫聯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密切得多。正因為如此，中國大陸的道教界的緊密程度已經今非昔比了，現在已經不能用“一盤散沙”來形容了。作為一個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實體，道教在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也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權。可以預計，在新世紀裡，中國大陸道教的實體力量將會加強，處在三個不同生存環境中的道教，也會緊密關係，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共同發展。

目前道教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尚須重視解決。中國大陸的道教教育儘管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還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是如何好處理信仰教育和知識教育關係。道教院校培養的目標是道士，而不是傳授道教知識。說到底，道教院校承擔著將有無神觀念或者泛神觀念的青年轉變為神職道士的任務，當然，這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是合法的、合理的。不過，要通過短短三年完成這個目標，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儘管道教院校在課程設置和宗教活動方面作了精心安排，但是，還是有些學員畢業以後，做了道士，而心裡並不真正信仰道教。

第二是如何處理好信仰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關係。要求學道的青年的入道動機是複雜的。其中道門子弟和因信仰而入道的青年只是少數。大多數是因為升學受阻，感情挫折，健康欠佳或者就業無門而踏進道門的，因此，道教院校還承擔著將謀生目的學員轉變為有信仰的、願意為道教事業獻身的神職道士的任務，當然，類似情況在全世界各宗教的院校中也普遍存在著。儘管道教院校在教義思想的課程和宗教活動的實踐中也做了針對性安排，但是，還是有些學員畢業以後，做了道士，視同謀生。舉止言談，不像有道之士。

第三是如何加強道教院校的教務管理工作。道教興辦院校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因此，對於如何辦教育還缺乏經驗，例如，在如何管理學員，如何管理師資，如何設置課程，如何上好課，如何組織好課堂宗教活動等問題，都只能摸索著處理。有的道教院校甚至不知道如何去積累經驗，包括如何積累教案，如何積累講義和教材。當然，這在頭十年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因為，當時大陸道教面對著百廢待興的局面。但是，現在已經正常化了，這就有必要進一步提高辦學的自覺性，及時總結經驗，完善教務管理工作。

第四是如何增加道教院校的投入，將培養青年道士和教化普通信徒的工作持久地開展下去。在中國大陸五個宗教的院校中，道教院校的設備和設施都是比較差的。這裡有歷史的因素，也有道教本身財力的因素，但是，也有不重視投入的因素。如果道教真的將道教教育當作關係道教生死存亡的大事來認識，無疑，應該將建設比較完善的院校與修廟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來對待，將培養高素質的道士的工作持久地開展下去。